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程及经验

杨德山, 刘 鑫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按主要特征分期, 这一探索过程可分为五个颇具特色的阶段, 即“从新民主主义道路的短暂尝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迅速转变”“吸取苏联教训, 独立自主探索新道路”“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基本成形”“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70年艰辛探索的根本经验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19)06-0005-06

DOI: 10.16354/j.cnki.23-1013/d.2019.06.001

通过何种路径,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自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直面的时代主题。在一代代前辈探索失败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努力, 成功地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对这一过程进行简略的历史梳理, 既可以从一个侧面增进人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辉煌成就的感性认识, 又可以丰富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理性思考。本文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加以叙述, 并在此基础上做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一、从新民主主义道路的短暂尝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迅速转变

恩格斯在论及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指出, 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来说, 新中国的成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民族独立化、政治民主化等先决条件。在此前夕, 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经验, 认为中国现代化首先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即革命胜利后, 国家将长期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 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

和发展生产事业, 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者集体经济、劳动者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同构成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新经济形态^[2]。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进行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社会运动的同时, 奇迹般地恢复和重建了经济秩序: 工农业总产值、工农业各主要产品产量迅速到达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 财政收支平衡, 物价稳定, 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但是, 也就在这一时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身矛盾日益显露: 私人资本的唯利本性以及土改后农村的两极分化, 与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和追求、与这一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过渡时期”论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经济基础相悖。加之,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独特社会形态存续时间估计的不确定性以及苏联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现代化由此中断。

1953年年底, 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

收稿日期: 2019-09-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建设基本理论研究”(16ADJ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理论史(学说史)视角的描述和分析”(16JJD710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德山(1966—), 男, 江苏大丰人,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党的建设研究; 刘鑫(1988—), 男, 山西太原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在这条被称为“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中，“一化”为体，“两翼”为用，其成立的理论依据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保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总路线同时借鉴了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一方面创造性地采用和平赎买的手段，实现了所有制变革和人的改造相结合；另一方面，继续力争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中国从此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在“总路线”指导下，“一五”期间新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6.7%，重工业产值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45%^{[4] 417}；不但基本具备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产业，不少大中企业拥有了20世纪40年代的先进技术，而且第三次产业革命出现的新兴产业也已经起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完成，1956年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统治地位，达85.6%^{[4] 359-360}；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体系完全形成，市场作用基本消失；经济决策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平均化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也基本形成。整体来看，短短五年时间内，这种仿照苏联并得到它支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已具雏形。

二、吸取苏联教训，独立自主探索新道路

当然，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采用计划指令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且三者有机统一的现代化建设模式^[5]的弊端也很快显现出来，并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分析和解决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经过半年多的思考和探索，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新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持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整个工业和农业正确的比例；必须促进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努力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6]。这些认识尽管并不十分成熟，但已经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有了一定的区别，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当时认可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前提下，开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

当然，这种探索过程充满艰辛、曲折。在其后的20多年中，围绕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若干重要问题，党内产生了分歧、冲突和斗争：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缘于对“过渡时期”理解的不同，出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差异；进而有了中心任务是“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冲突；在依靠力量方面，尽管1956年有了进入原子能时代的清醒认识，有了“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向科技进军”自觉，但自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现代化建设直接推动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一直处于被怀疑、被排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而工农兵成为“科学实验”的主力；在经济建设方针方面，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稳步前进的主张，与依靠群众激情并采用运动方式、求多求快的意见产生冲突，后者往往被视为革命、积极的象征，前者被当作保守、右倾的表现，凡此等等。认识上的差异往往还被上升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之争，并随之产生党内人事组织上的非正常的调整。

不过，就是在这一曲折时期，一方面，从来没有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追求。1964年12月，明确提出用35年时间、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主张；1975年1月，重申了这一目标。另一方面，尽管“抓革命”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生活的主旋律，但是“促生产”并未放弃，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收入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重要的是，在对外关系方面，这20多年间，先后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全球战略主张，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政治威望，为日后开展正常的经贸往来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上半期，中美关系的突破、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与大多欧美发达国家和欧共体正式关系的建立，为中国在经贸、科学文化方面与世界现代化新水平接触，向发达国家学习创造了条件。虽然国际共运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和论战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但也坚定了党和人民自主、自尊、自立的信念。

三、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做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此在承继之前近30年探索成就的基础上进入全新的摸索阶段。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旗帜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进入全面创新境界。

第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为现代化布局展示全新局面。在对世情分析的基础上，用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代替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判断;在吸取国际共运教训的基础上,停止了意识形态论战;在对国情分析的基础上,以“生产力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了“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得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的结论和命题。

第二,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新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以生产力而不是以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为根据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得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并由此确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基本路线,明确其目标在于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5]。

第三,拓展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新时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新时期后,党从历史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仅仅关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够的,“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是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

第四,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路线图。初级阶段的提出和现代化内涵认识的深化,对二战后世界现代化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发展状况的分析,使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初很快放弃了20世纪内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规划,提出了10年时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20年时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用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16]。与之相应,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等也在这些战略目标之内。

第五,选择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法、关键抉择。通过“抓革命”、开展“群众运动”、调动央地积极性、执行“鞍钢宪法”等是新时期之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方式方法^[14]。新时期之初,中国共产党直面体制弊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经验,选择改革开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式。“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11],而且改革要深入到政党、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放是面向的是整个世界的开放,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重在吸引外资、技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重在推动国家关系正常化,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重在取长补短、互通有无^[19]。开放本身也是一种改革,它打开了人们的现

代化视野,推进了国内的各项改革;改革也从认识上、体制上、方式上促进了开放,二者相互推动、相辅相成。

在新的理论指导下,新时期之后的13年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农村、城市、科技、教育、政治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经济生活中,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11亿美元,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四、“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基本成形

从1989年4月到1991年12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国内怀疑改革开放国策之声不绝于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继续下去,令人疑虑。苏东剧变甫一尘埃落定,邓小平就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2]²⁰⁻³⁴。这些重要论断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第一,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指引下,根据新时期以来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经验,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强调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能够通过计划这一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提出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行政等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精神文明、社会生活、环境保护、军队国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要求^[12]¹⁶⁻³⁴。

第二,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之时,也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信息革命扑面而来之际,“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1]³⁷⁷⁻³⁷⁸。党的十五大强调将对外开放确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对外开放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区推进,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尤其是2001年年底,经过近10年的实质性“复关”谈判(开放市场),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由此进入全方位、依法规、互通性的新境界。

同时开放的扩大,也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提出并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理念和方向。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一直以超过中国共产党估计的速度飞快增长,但是基层群众生活、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市场经济规范、社会治安形势都存在若干不足。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增加了“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角度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则专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决定。此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将其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的重要内容。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目标的提出更加深刻地体现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执政理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适应和领导现代化过程中推进党的建设、党的领导的理论和体制创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基本路线的确定,要求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工作必须与之相应。就党建而言,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的目标,并以实践为依据,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干部队伍、党的作风、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等若干方面提出新的主张。进入1990年代后,国际国内发生的深刻变化,促发党重新认识和思考党建若干基本问题,并形成新的党建理论观点,如将党建工作视为一项系统性的“新的伟大工程”,从历史演变角度说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从执政环境阐释党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确定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总目标,并由此形成“一条主线,五个方面”系统性的工作布局。就党的领导而言,一方面,党从历史必然、现实必要、未来必须视角,反复说明中共的政治、法律地位的合法、合理、合情性,始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一切活动必须在宪法以及法律框架内进行,保证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业务工作的独立性,保证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自主性;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内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新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命题,提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五种能力”建设和

全党的“五大能力”建设的要求,进而使“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等三者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勾勒出与现代化建设方向相一致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较为完整的政党建设理论体系。

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既反映在实践探索中,又体现在理论创新中。

第一,从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经过长期,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奋斗,当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以此为基础,其他各个方面也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生机勃勃、方兴未艾之势,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其展现出的态势,足以说明:就中华民族而言,在近代饱经磨难一百多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即将实现;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的500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尤其是170年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尽管屡遭挫折,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而使其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就全人类现代文明而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目前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而且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不但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而且意味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样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这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从全新的时代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认识更为深刻。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它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位,造福于人民的现代化,是在推进物质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不断提高人的自身现代文明素质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

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系统性、整体性、有机性相统一的现代化。‘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3]。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进入新时代。这集中表现为,尽管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化,但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前景提出新的要求。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愿景和路径。就远景而言,经过长期努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整个国家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谱系自然就随之调整:从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达到目标的途径而言,以党的十八以来的探索成就论,分为三个层次:在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的布局中,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推进;在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有机统一。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是基础,是关键,是党的中心工作。在经济建设中,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自然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认识更为深刻。具体表现为:视“党的领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必须以自我

革命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尤其要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根本性和首要地位、统领作用,做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4]。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不断增强党长期执政的能力,才能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目标。

纵观70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艰辛历程,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形成发展看,这条路线真正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理论、实践等三种逻辑的有机统一。

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论,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从历史逻辑看,在国家政权基本巩固后,党就将实现国家工业化与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两项任务同时并举。在后一项任务完成之后,更是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只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并存,而又因为领导人个人因素影响后者重于前者的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至此党执政后的工作重点才真正走上正轨。其中的过程恰恰展示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基本过程和总体趋势。从理论逻辑看,这一战略决策的转变是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实际运用和理论创新^①。从实践逻辑看,最近四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令全世界惊羡的发展成就,整个社会一直基本处于安定和谐状态,党的威信不断提高,执政基础日益坚固,与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信念紧密相关,“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

^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主义革命分为四个阶段,强调在完成了政权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后,共产主义政党应该带领人民进行生产力的革命,“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13]。

就“四项基本原则”而言,它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从形成过程看,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当然,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立国之本成为几代人的共识并非一蹴而就。1957年出现的右派分子极端言论,198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9—1991年间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地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的“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一直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国之本的坚守。从理论上看,“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其他三个坚持就无从谈起。敌对势力要否定、颠覆的最根本的也是这项原则——以多党制代之,使中国回到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从现实看,经过4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深切地认识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4]。

就“改革开放”而论,它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就历史过程看,尽管它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未间断,只是某一阶段由于一些客观因素而不如后来之深、之广、之准而已。也正是有了新时期之前的探索经验和教训做基础,才有了新时期之后的成就。不顾历史事实,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动辄用闭关锁国描述新时期之前新中国对外交往状况,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从理论依据和发展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认为,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而全球化是其基本趋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5]。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时期,党和政府从未放弃对外的经贸、技术、文化、资金的交流,也从未对任何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导体制固守不变。这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治国理政的。从实践活动看,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成就,完全取决于改革的不断深化、开放不断扩大。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构成基本路线内容的各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16]。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30.
-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0-1433.
-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01.
-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65-166.
-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15-316.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8.
- [10]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N].人民日报,1975-01-21(1).
- [11] 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74.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31.
- [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8-10-28.
- [15]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N].人民日报,2018-12-19(2).
- [1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N].人民日报,2016-07-02(2).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 [18] 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2016年9月29日)[N].人民日报,2016-09-30(2).

(责任编辑:刘建明)

本刊作者简介



杨德山 教授 1966年生，江苏大丰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北大创学社副社长。从事党的建设、党史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各1项，主持省部级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共4项。出版《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学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江泽民执政党建设

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新时期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专著4部、合著2部；译著《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1840—1876》（中华书局，2006年版）1部；主编《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一套（5本），《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一套（4本）。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教学与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新视野》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北京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等称号。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2018年第1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程及经验》（本期）。

倪 星 教授 1969年生，湖北随州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广东省人社厅、住建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卫计委，广州市政府，佛山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中国政治与政府、廉政与治理研究。迄今共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包括中文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政治学研究》，英文SSCI顶级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等。出版个人学术专著3本、主编著作8本、

教材9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and 青年项目各1项，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专项项目和青年项目各1项，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各1项。主持完成广东省纪委、省发改委、交通运输厅、公安厅、司法厅等委托课题50余项，多项决策研究成果被采纳，获得过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称号和奖励。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政治忠诚、专业能力与党员发展——基于CGSS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2018年第1期）、《政治关联、地区差异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本期）。

